

《水浒传》英雄人名英译中的功能性叙事与译者行为批评

陈亮^{1*} 何浩文² 开圆圆³ 李超凡¹ 寇泽玉⁴

(1.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250; 3. 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4. 拉曼大学, 马来西亚 吉隆坡 31900)

摘要: 本文聚焦于《水浒传》英译本中边缘性英雄好汉的称名翻译, 通过对赛珍珠与沙博理两位译者的全译本, 深入分析了功能性人物叙事方面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 赛珍珠译本在人物称名上追求忠实原文的同时, 兼顾表达实用性, 有效维护了功能性叙事的真实性, 展现了实事与求是的良好平衡。而沙博理译本虽同样注重称名的忠实性, 但在部分人物的功能性叙事中体现出对语境适应性的考量。此外, 两位译者在处理人物称名时均频繁使用“保留”策略, 但在具体策略上, 沙博理更倾向于“省略”, 而赛珍珠则多采用“转化”方法。本研究将人物称名与功能性叙事纳入翻译批评范畴, 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评估了译本在传达原著文学性方面的表现, 为《水浒传》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 水浒传; 英译本; 功能性人物叙事;

1. 前言

在学术领域, 《水浒传》的英译本研究中,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 *All Men Are Brothers* 以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中文功底, 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准确且富有艺术性的英译版本, 成功地将原著的精髓和文化内涵传递给了国际读者。而中国籍美国翻译家沙博里的 *Outlaws of the Marsh* 则以其流畅且精确的译文, 在保持原著风格的同时, 成功地再现了《水浒传》中草莽英雄的光辉形象, 展现了施耐庵笔下英雄人物的独特魅力。这两个译本在学术界均享有较高的声誉, 被视为《水浒传》英译本的经典之作, 对推动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和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全译本《水浒传》成为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该作品翻译的丰富素材。为了深入剖析《水浒传》翻译研究的当前学术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些学者采用文献计量法, 对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分析。程思茜等人借助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CiteSpace, 对《水浒传》翻译研究在选题取向、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框架等方面现状进行了详尽的综述^[1]。研究结果表明, 相较于《西游记》的翻译研究, 《水浒传》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外学术领域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这与《水浒传》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及其悠久的英译历史并不相称。当前翻译研究的重心显著偏向于微观分析层面, 倾向于将译文拆解为孤立的文本片段, 并借助语篇语言学与文体学等理论工具来评估翻译策略的有效性。然而, 这种分析框架往往未能充分捕捉译文作为完整叙事作品的内在连贯性与艺术价值。在中观研究层面, 一种新兴趋势是将译文视为一个连贯的故事整体, 运用叙事学

作者简介: 陈亮(1990-), 男, 博士, 讲师。

何浩文(1999-), 男。

开圆圆(1991-), 女, 助教。

李超凡, 研究生, 助教。

寇泽玉,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通讯作者: 陈亮

理论深入探讨其主题意蕴、情节结构等叙事要素。尽管这一视角有所进步，但鲜有研究能够细致剖析翻译策略如何在叙事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以及这些策略如何影响译文的叙事效果。从宏观研究视角出发，研究者们则将翻译活动置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广阔框架内，考察《水浒传》等经典文学作品与世界文学体系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这种跨文化互动如何塑造翻译实践的策略选择，特别是在目标文化语境的适应性方面^[2]。他们致力于探索创新性的翻译策略，以期更精准地对接目标读者的文化期待与阅读需求。这三个研究层面虽各成体系，独立发展，但其间亦存在紧密的联系与交织。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深化中观与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时强化它们与微观层面的跨学科对话与融合。

鉴于上述考量，本文旨在融合“实事一求是”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与 Davies 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理论，首先从微观层面细致对比两个《水浒传》全译本中好汉译名的英译策略，随后逐步拓展至宏观视角，深入考察这些译名在叙事结构与文化传达中的广泛影响。

当前对《水浒传》译本中的人物研究主要聚焦于主人公（如宋江、林冲和武松）的深刻形象塑造，而边缘化角色及功能性人物虽在构建故事世界、丰富情节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却相对被忽视。在《〈水浒传〉英译本研究》中，王宏志教授只分析宋江角色蜕变：从草莽到领袖，通过公正决策与援助弱小展现慈悲正义，超越个人利益，与梁山命运及社会正义相连，最终凭智慧与人格魅力赢得众兄弟敬仰，成为精神领袖^[3]。作为一种边缘角色的存在，边缘性英雄好汉契合了功能性配角的定义：边缘化的英雄好汉如同细密的经纬线，虽非主线焦点，却对情节逻辑的连贯性至关重要。他们以短暂的叙事时效灵活穿插，应景而生，展现出叙事意图的即时性；其反复出现的频率，不仅强化了故事的节奏感，还微妙地引导着读者的情感波动。更重要的是，这些边缘人物往往承载着寓言性的叙事旨趣，通过他们的经历与选择，寓言式地映射出更广泛的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度，为整部小说增添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与哲学思考。功能性人物往往呈现出显著的符号化特征，即弱化了具体人物的实指性，转而强化了其形而上层面的概括性与象征意义。此外，他们还扮演着关锁的角色，通过诗词、命名等巧妙手法埋设伏笔，使得前后叙事紧密相连，形成巧妙的呼应与关合。同时，这些人物也承担闲叙的功能，以非主干情节的形式出现，不仅丰富了故事层次，还有效调节了叙事的节奏与氛围。预叙则是他们另一项重要功能，即在故事发展中提前透露后续事件的线索，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与期待感，引导情节自然流畅地展开。《水浒传》中边缘性英雄众多，尽管他们的出现频次不及核心人物，且多局限于独立章回，未能在表面叙事上形成直接的连贯桥梁，但不少边缘英雄的命名蕴含深意，他们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丰富而独特，值得深入探究。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语读者而言，初读《水浒传》译本时，可能会因频繁出现的功能性人物而感到阅读上的疲劳，进而影响整体的阅读体验。毛清予指出，《水浒传》中英雄事迹与战斗场景的重复性特征，导致译者在编译节译本时，倾向于挑选具有代表性的英雄故事进行呈现^[4]。考虑到西方读者可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手法及深厚文化背景了解有限，从功能性叙事的角度对《水浒传》译本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促进跨文化理解和欣赏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边缘性英雄好汉在功能性人物叙事中的角色

之前业内专家专注于明清小说中小人物的功能性叙事研究，本文则聚焦于《水浒传》中那些承载着特定叙事使命的符号化角色——边缘性英雄好汉。相较于细致雕琢的主人公，这些边缘人物虽不显山露水，却在反衬主角光辉、呼应主线叙事方面功不可没。鉴于已有学者从功能性人物叙事视角深入剖析了《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章回小说，本文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旨在提炼并总结《水浒传》中具名小妖所扮演的主要叙事功能^[5]（见表 1）。尤为重要的事，这些叙事功能往往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文本之中，特别是

符号化作为边缘人物存在的基础条件，使得分析其他叙事功能的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在叙事的故事层面，“闲叙”关乎故事内容的选择与构建，它丰富了故事的层次与细节，决定了“讲什么”。而“预叙”则属于叙事的话语层面，它探讨的是故事叙述的技巧与策略，即“如何讲”，通过提前透露未来情节，激发读者的期待与好奇心。至于“关锁”，它横跨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既体现在不同故事单元之间主题或情节的呼应与关联上，也反映在叙事结构或语言风格上的相似性，确保了叙事的连贯性与深度。

功能	表述
符号化	出场时间较短的临时性人物，且特征相对单一，可以指代那些在故事中短暂出现，主要为了执行某项特定任务或提供某种特定信息的角色。 旱地忽律朱贵： 他主要在梁山泊外经营酒店，负责打探消息和接引上山的好汉。朱贵的角色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作为梁山与外界的联络点，但他的存在为梁山好汉的集结和情报收集提供了重要支持。
	凭借叙事上的相似性，小说中前后情节得以紧密相扣，因果相承，编织成一条潜藏的逻辑脉络，确保了故事的连贯性和深度。
关锁	神行太保戴宗： 戴宗以其神行术闻名，多次为梁山好汉传递消息和情报。他的行动迅速且高效，使得梁山好汉能够及时了解外界动态并作出应对。戴宗的角色虽然不是故事的核心，但他的行动与主要情节紧密相连，通过相似性的叙事手法使得前后情节关联一体。
	侧线波澜：意外转折，助推剧情。 拼命三郎石秀： 石秀发现杨雄妻与裴如海的不当关系，这一转折将他卷入复杂情境。他非但未退缩，反而智勇双全地布局揭露真相，除掉裴如海。这一过程中，意外与智谋并存，展现了石秀的多面性格，也推动了故事向高潮发展，体现了“侧线波澜”的精妙作用。
闲叙	调控节奏：放缓步调，编织波澜起伏的情节。 鼓上騷时迁： 作为梁山泊中的一名边缘人物，以其独特的偷盗技能和特殊身份在故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他的身份并不光彩，但他在梁山泊中的地位却不可或缺。时迁的故事线与主线情节巧妙交织，他通过机智的偷盗行为为梁山泊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收获，为故事增添了丰富的波澜。同时，他的行动也巧妙地打破了主情节的紧张节奏，使故事在紧张之余又展现出轻松幽默的一面，有效地调控了整个故事的叙事节奏。
	激发好奇心：悬念重重，引领阅读新期待。 白日鼠白胜： 作为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时的重要成员，其命运波折充满悬念。读者不禁好奇，他是如何陷入官府的追捕并被打入大牢的？而在困境之中，梁山泊的好汉们又是如何巧妙策划，英勇营救他脱险的？更引人关注的是，白胜在加入梁山泊后，又将如何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预叙	预示剧情脉络。 花项虎龚旺： 龚旺是东昌府将领张清的手下副将，擅长使用飞枪。他在与梁山泊的交战中展现了出色的武艺，后来被俘并归顺梁山。龚旺的加入暗示了梁山泊对外部人才的吸纳和壮大，同时也为后续的战斗情节埋下了伏笔。

表 1 边缘性英雄好汉的叙事功能概览表

2.2 译者行为审视与实证：基于实事求是原则的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体系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聚焦于“译者在翻译社会中的行为演化过程、角色定位及其作用于文本的规律性特征”。此理论以译者行为为核心，系统整合翻译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外部环境、文本分析与人文视角之间的复杂关系，旨在提供一种既审视翻译技艺精细度又兼顾翻译成果社会效应的综合性翻译批评框架^[6]。“实事求是”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则是该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深入探究译者的语言处理能力（语言性）与其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性）之间的动态交互，以及这种交互作用如何影响译者的角色扮演与译文最终效果的相互关系。该模式强调，优质的翻译实践需兼顾语言层面的精准表达与社会文化层面的恰当融入，确保译文在忠实于原文精髓的同时，有效适应目标语言文化环境，从而实现翻译活动的真实性与实用性的和谐统一。在学术语境下，“实事”意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致力于忠实再现原文的意涵与语境，确保原文的语义、风格及文化负载得以精确传递，这一过程体现了对原文真实性

的尊重与追求。“求是”则是指译者在面对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挑战时，能够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以适应目标语言文化环境的需求与期待，促进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有效流通与接受，这一过程彰显了翻译的实用主义导向。“实事求是”译者行为连续统模型，作为一种动态、连续的分类框架，深刻揭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与策略调整机制。在此模型中，“实事”与“求是”被视作连续统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译者对原文忠实度与社会适应度的极致追求。位于两者之间的是一系列渐变的翻译策略，译者根据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读者群体等因素，在“实事”与“求是”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译者行为批评，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其本质属性聚焦于人本主义研究，强调对译者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深入探索与分析。它以描写翻译学为理论基础，通过细致描绘译者的翻译实践、翻译选择及其背后的杜会、文化、心理等因素，揭示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同时，个案研究作为推动译者行为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对具体翻译案例的深入剖析，为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数据与深刻见解，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就《水浒传》的翻译研究领域而言，宏观层面的“实事求是”评价虽已在翻译史研究中奠定一定基础，但当前研究亟待深化与完善的方向主要聚焦于三方面：其一，需深入剖析原文中独有的翻译挑战，细腻描绘译者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所展现的翻译策略与行为模式。例如，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系统分析《水浒传》中富含文化内涵的表达、地域色彩浓厚的方言俚语及复杂多变的人物对话，揭示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如何平衡文化保真与语言适应性，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深层考量。其二，应倡导构建一种兼顾微观语言层面与宏观文化层面的双向翻译评价体系。该体系不仅要求审视译文在词汇选择、句法结构等微观语言细节上的精准度与地道性，还需评估其在整体风格把握、文化背景再现等宏观文化层面上的表现。通过这种双向视角的融合，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译者在忠实于原著精神与适应目标语言文化环境之间的微妙平衡。其三，强调关注译者行为轨迹的连贯性与动态性，特别是分析译者在不同翻译阶段的行为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以《水浒传》的知名译本为例，可以追踪译者在初译时的策略初探、修订过程中的调整完善，乃至因读者反馈或个人翻译理念转变而进行的再译实践。这些过程不仅展示了译者“忠实观”的动态演变轨迹，也揭示了翻译活动作为一种持续对话与自我反思的文化实践的本质。综上所述，《水浒传》翻译研究应更加注重结合原文特色进行深入挖掘，融合微观与宏观视角构建全面评价体系，并动态追踪译者行为轨迹以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旨在通过译者行为批评的视角，深入探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1) 如何运用“实事求是”连续统模型来评估两个《水浒传》全译本中边缘性英雄好汉名称的英译策略？2) 这些名称英译策略如何具体影响功能性叙事的传达效果？3) 进一步地，如何从译者的社会化角色出发，反思译者在文本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身份及其行为选择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在《水浒传》这部文学巨著中，边缘性英雄好汉作为核心组成部分，其形象构建不仅依托于个性鲜明的刻画，更深深植根于丰富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形成了复杂而多维的文化专有元素^[7]。这些元素，蕴含了丰富的语义层次与独特的文化符号，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所在。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这些边缘性英雄好汉形象在异域文化中的再现效果。一方面，译者需紧密遵循原著语境，力求准确捕捉并忠实传达这些角色的独特性格、背景故事及深层文化内涵，以确保译作能够忠实再现原著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译者还需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与创造性，能够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恰当的翻译手法，建立起与目标语言文化读者之间的桥梁，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与深层次的文化对话。因此，理想的翻译实践应当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既强调对原著的忠实性，又注重译文的创造性与适应性。通过这样的翻译策略，不仅能够吸引异国读者深入了解《水浒传》及其边缘性英雄好

汉的独特魅力，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实现文化的共融与发展。到目前为止，学界存在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谱系（见表 2）。

作者及年份	定义关键词	详细说明
Aixelá (1996)	重复、转写、语言翻译外延意义、文内注释、文外注释、删除、相对泛化、绝对泛化、归化、创译、同义词	将翻译视为一种重复或复制的过程，强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应性和相似性。保留原文的某些特征或元素，涉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如直译、意译等。
Davies (2003)	保留、增译、省略、全球化、本地化、转化、创译	涵盖不同书写系统之间的转换，强调语言符号的直接转换过程。包括语音到文字的转换，以及不同语言间相似符号的对应转换。
Fernandes (2006)	复制、字母转写、语音替换、直译、增译、删除、替代、创译、词类转化、套译	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工作，根据目标语言和文化背景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造。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涉及文化、社会、历史等多个层面的交流和融合。
Epstein (2012)	保留、改编、直译、注释、删除、替代、增译	提到翻译中语音符号的替换和对应，对理解翻译中的语音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认为翻译是复杂的语言和文化转换过程，需综合考虑原文、译者、目标语言、文化等。

表 2 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谱系概览

从所呈现的策略图谱中，对 Aixelá、Davies、Epstein 及 Fernandes 等学者关于翻译过程的深入剖析，为构建了一个“实事一求是”的连续统排序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Aixelá 的理论根基在于翻译应作为原文的忠实再现或复制，其立场鲜明地倾向于“实事”的一端，强调翻译需高度尊崇并传达原作的精神实质与风貌。Davies 则侧重于书写系统间转换的研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跨越语言障碍的适应性与策略性。Epstein 的独特贡献在于引入了文化因素的考量，他主张在翻译实践中应微妙地平衡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张力，既保留原文的文化精髓，又确保其在目标语境中的文化适应性与可接受性，这一观点成为“实事”与“求是”之间的关键桥梁。进一步地，Fernandes 的研究深刻揭示了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维度，他指出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并塑造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一洞见提示我们在构建“实事一求是”连续统时，必须充分考虑翻译活动所处的复杂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翻译实践的深远影响，从而增强翻译策略的社会现实性与历史深度。本文采纳了 Davies 所构建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谱系，以此作为翻译策略描写的核心框架。具体原因如下：审视 Davies 的分类体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无可比拟的适用性。它不仅在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描写中游刃有余，还扩展至其他专有名词领域，这一全面性使得它在跨文化对比中尤为突出，相比其他偏重专有名词的体系，Davies 体系在信息的全面捕捉上更显优势。进一步探讨其可操纵性，Davies 体系通过精细的策略划分，创建了一个策略间界限清晰、易于操作的框架。这种设计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迅速定位并选择合适的策略，完美契合了

“实事-求是”的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Davies 在策略选择上展现出的深刻洞察力，如以“全球化”取代 Aixelá 的“泛化”，这一创新不仅深化了跨文化移情的理解，还有效避免了文化极端主义的陷阱，为文化的顺畅交流铺设了道路。相比之下，Fernandes 与 Epstein 的策略划分虽详尽，却因梯度不明显，难以在连续统内找到明确的定位。而 Davies 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凭借其清晰的梯度划分和强大的实用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实事一求是”译者行为连续统中的重要一环，为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从两幅鱼骨图中可以看出“省略”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恰好位于“实事”与“求是”两个概念间那连续而微妙的过渡地带。研究采纳了Fernandes关于文本“删除”策略的深入剖析，指出：当采取部分省略的方式时，这种做法更倾向于坚守“求真”的立场，致力于维护原文信息的本真面貌；相反，若选择全面省略，则明显偏向“务实”的方向，这种选择往往是基于特定的上下文需求或目标导向，从而实现了更为直接且有针对性的内容缩减。

4. 研究发现

在深入探索《水浒传》的译名策略时，本研究不仅聚焦于这一微观层面的译者行为，还进一步揭示了译名如何深远影响功能性叙事的结构与效果。以“鼓上蚤时迁”与“拼命三郎石秀”为例，这两大角色，尽管各自故事线穿插于不同章节，表面看来无直接联系，实则通过译名深刻预示了他们的性格轮廓，成为功能性叙事中的点睛之笔。石秀的“拼命三郎”，一语道破其勇往直前、无惧生死的英雄本色；而时迁的“鼓上蚤”，则形象描绘了他如同跳蚤般灵活机敏、难以捉摸的特性。在梁山好汉的系列冒险中，这两位角色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贡献着力量，石秀以勇猛开路，时迁则以智谋铺路，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编织出紧张激烈的情节网。功能性叙事在此展现出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它并非故事的简单装饰或重复片段，而是构建“梁山聚义”史诗的坚实基石。通过时迁与石秀等角色的巧妙布局与互动，功能性叙事巧妙地实现了情节的层层递进与呼应，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叙事“关锁”，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深刻感受到《水浒传》深厚的艺术底蕴与叙事智慧。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视角审视，当两组译名均能有效实现预叙与关锁功能，进而确保功能性叙事的真实性时，这体现了翻译对叙事逻辑与人物性格刻画的精准把握。反之，若译名未能达成此目标，则功能性叙事的求真效果将打折扣。功能性叙事的求真务实，不仅是文学翻译质量的体现，更是译者跨文化翻译能力的直接映射，深刻影响着译本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鉴于边缘性英雄好汉普遍具有符号化的功能特性，这一共性在对比分析中不作为重点标注考量。因此，在对比两译本时，我们聚焦于译名对功能性叙事贡献的实际效果，具体分析结果汇总于表3。

边缘性英雄好汉	叙事功能	译名		译法		译者行为			
		赛译	沙译	赛译	沙译	赛译	沙译	赛译	沙译
神行太保戴宗	关锁	the Divine Speed Guardian	Swift-Walking Guardian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白日鼠白胜	预叙	Shadow Walker of Daylight	White Rat in Daylight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花项虎龚旺	预叙	the Striped Thunder	the Flower-Striped Tiger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没面目焦挺	关锁 预叙	the Faceless One	the Anonymous	保留	省略	实事	实事	求事	实事
金毛犬段景住	预叙	the Golden-haired Dog	the Golden-furred Hound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求是
通臂猿侯健	关锁	the Long-armed Ape	the Limb-spanning Monkey	省略	保留	求是	实事	实事	实事
活闪婆王定六	关锁	the Lightning Lady	the Flashing Woman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求是	求是
铁叫子乐和	关锁	the Iron Caller	the Steely Shouter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锦豹子杨林	关锁	the Brocaded Leopard	the Splendid Leopard	省略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菜园子张青	预叙	the Garden Keeper	the Horticulturalist	保留	省略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母夜叉孙二娘	预叙	Fierce Night Hag	ferocious female	保留	省略	实事	实事	求是	实事
玉臂匠金大坚	关锁 预叙	the Jade-armed Craftsman	the Jade-limbed Artisan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混世魔王樊瑞	关锁	the Chaotic World Demon King	the Lord of Chaos	保留	保留	实事	实事	实事	实事

表 3 水浒传中边缘性英雄好汉中英对比分析

我们将表 3 归纳为以下核心发现：赛译本在处理个别别称名时，采取了既尊重原文又富有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即便在某些译法上不完全追求字面直译，也成功地实现了功能性叙事求真。以“神行太保戴宗”和“白日鼠白胜”为例，赛译本分别译为“the Divine Speed Guardian”与“Shadow Walker of Daylight”，这两种译法不仅精准捕捉了人物的核心特征，还通过巧妙的词汇选择增强了译文的文学魅力和叙事深度。在“神行太保戴宗”的英译中，“the Divine Speed Guardian”一词不仅直接对应了其行走迅速的特点，更在英语语境中激发了读者对于超凡速度的想象，使得戴宗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样，在翻译“白日鼠白胜”时，“Shadow Walker of Daylight”的选词尤为精妙，它不仅巧妙地隐喻了白胜在光天化日之下依然能够机敏行事、隐匿无踪的特质，还构建了一个既现实又充满象征意味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刻画，继而实现了称名互文修辞的关锁功能。相比之下，沙译本虽倾向于直译，如将“神行太保戴宗”译为“Swift-Walking Guardian”，这种译法虽保留了原名的字面意义，但在传达戴宗超凡脱俗的行走能力上略显平淡，未能充分挖掘出原名的文学价值。而在处理“白日鼠白胜”时，若仅采用直译方式，如“White Rat in Daylight”，则很可能无法充分展现白胜作为“白日鼠”所特有的机智、狡猾以及在光明之中仍

能游刃有余的能力，从而削弱了译文的叙事效果。综上所述，赛译本通过创造性翻译策略，在保持原文真实性的基础上，成功地提升了译文的文学价值和叙事效果，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阅读体验。而沙译本虽然也有其价值所在，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显得较为平实，缺乏赛译本那样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两位译者对于部分角色的称谓理解存在分歧，例如对于“花项虎龚旺”的描述。尽管这些角色名称在文献中的出处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但译者赛珍珠将其翻译为更加贴近西方文化理解的表达，例如将“花项虎龚旺”译为 Gong Wang, the Striped Thunder，而译者沙傅里则采用更加直接和形象的翻译方式，如“Gong Wang the Flower-Striped Tiger”。尽管赛珍珠的翻译在考古意义上更为精准，但从叙事的功能性来看，沙傅里的翻译更能体现原著中的戏剧性和角色特性。在原著中，正是由于花项虎龚旺的急性子，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和冲突。沙傅里的翻译可能会因为过于直译而忽略了这些微妙的叙事效果。因此，译者的务实行为可能会导致赵国月所说的“分化情况”，即不同的译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目标语言读者的接受度，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

在《水浒传》的翻译工作中，两位译者在角色名称的翻译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虽然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但两位译者都展示了他们在翻译策略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显示出他们对语言的高度自律。赛珍珠的翻译倾向于省略，而沙傅里则更倾向于转化。例如，赛珍珠在翻译时去掉了“金毛犬段景住”和“通臂猿侯健”的动词标签，这种做法在叙事功能上无法达到沙傅里译本中“Golden-Mantled Hound Duan Jingzhu and Hou Jian, the Agile Ape-Armed Warrior”的效果，后者通过动名词的使用成功塑造了角色的英勇形象，同时也保留了原文的预叙和反讽效果。

翻译作品是译者对语言掌握和运用的自我约束的成果，同时也是其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角色定位的体现。赛珍珠（Pearl S. Buck），这位出身于美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其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深刻描绘而闻名遐迩。她的翻译作品不仅展现了她对语言的敏感和自律，也反映了她在中国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角色。在中国长大的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她的中文能力同样出色，为她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赛珍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理解，使她的翻译工作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认可。她的翻译理念着重于作品的可读性和文学性，坚持认为翻译应该让读者感受到原作的魅力，而不应仅限于学术研究。在她的翻译作品《水浒传》中，赛珍珠力求在忠实原文的同时，也要方便西方读者轻松理解与欣赏。然而，尽管赛珍珠有着深厚的中文功底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她在翻译过程中仍面临着挑战。她需要在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文化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赛珍珠的翻译策略有时更偏向于使作品对西方读者更加友好和易于接受，这可能导致一些原文细节的牺牲。这种偏向可能会让人推断，赛珍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并没有完全把握原著的叙事脉络，尤其是《水浒传》中那些边缘性英雄好汉的功能性叙事。这些角色在原著中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深层的社会批判，而赛珍珠的翻译可能并未充分传达这些角色的复杂性和原著的深度。

沙傅里作为一位学者型译者，其翻译行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对原文文化的深刻理解。沙傅里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文学、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广泛知识，力求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沙傅里的学者身份为他提供了与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他与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就《水浒传》的翻译和理解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翻译视角和理解深度。在翻译过程中，沙傅里尤其注重对原文中的历史背景、人物性格、社会矛盾等复杂元素的准确传达。在翻译《水浒传》时，沙傅里面临诸如古代汉语词汇、特定文化概念等翻译难题，他通过与专家的讨论和自己的研究，努力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这种对原文的尊重和对翻译质量的追求，使得沙傅里的译本在语言层面上力求真实，同时在传达原作的文化精神和叙事风格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求真性。

另一方面，沙傅里译本在功能性叙事方面的求真并非偶然，这源于沙傅里坚定的“文化可译论”立场。在译本序言中，沙傅里明确指出，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纠正以往节译本可能存在的文化误解。他批判了那些认为原文中某些概念、行为、表达不可译的观点，认为这是对当代读者理解能力的低估。沙傅里译本的发布，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讨论和反响。通过他的译本，沙傅里不仅展现了对《水浒传》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对原作的尊重和学术态度。评论家们在比较沙傅里译本与其他节译本后，普遍认为沙傅里的译本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他们指出，沙傅里译本通过高度再现原文的诗学叙事，成功传达了《水浒传》中的深层寓言结构和英雄叙事。沙傅里译本的特色在于其运用特殊的行文方式，不仅忠实于原文，更在传达原作的深层文化和哲学思想方面展现了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翻译技巧。这种翻译方法使得译本能够投射出超越字面意义的更为复杂的意义模式，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综上所述，沙傅里作为学者型译者，他的优势在于能够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水浒传》的寓言意义和叙事结构。他的译本不仅在语言层面上追求真实，更在文化传递和深层意义的表达上展现了高度的学术价值，实现了功能性叙事的求真。

5. 小结

本文深入探讨了《水浒传》英译本中边缘性英雄好汉的称名翻译问题，通过对赛珍珠与沙博理两位译者的全译本，分析了他们在边缘性人物叙事方面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赛珍珠译本在追求忠实原文的同时，兼顾了表达的实用性，有效维护了功能性叙事的真实性，实现了求真与务实的平衡。沙博理译本在忠实性的基础上，更多考虑了语境适应性，尤其在部分人物的功能性叙事中体现出这一特点。两位译者在处理人物称名时，均采用了“保留”策略，但沙博理倾向于“省略”，赛珍珠则偏好“转化”。本研究将人物称名与功能性叙事纳入翻译批评范畴，从微观与宏观角度评估了译本传达原著文学性的表现，为《水浒传》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赛珍珠译本的创造性翻译策略，在保持原文真实性的基础上，提升了译文的文学价值和叙事效果，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阅读体验。沙傅里译本则在语言层面上力求真实，同时在传达原作的文化精神和叙事风格上表现出了高度的求真性。沙傅里译本的发布，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讨论和反响，被认为是具有显著学术价值的翻译实践。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理解《水浒传》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提供了深刻见解，也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通过对两位译者行为的深入分析，本文强调了在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保持文化敏感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性。随着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和接受，对《水浒传》等经典作品的深入翻译研究将持续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发展^[8]。

参考文献：

- [1] 程思茜,王先好.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述评——基于 CiteSpace2001—2019 年的知识图谱分析[J].黑河学院学报,2023,14(02):118-122.
- [2] 张铱.中国古典文学外译中的文化阐释与传递——以《水浒传》巴赞法译本为例[J].中国翻译,2024,45(03):45-53+190.
- [3] 李菁,王烟朦.副文本视野下沙译《水浒传》的译者主体性解读[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5):81-86.
- [4] 蒲婷艳,李海军.《中国巨人历险记》——《水浒传》首次英译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24(02):140-149.
- [5] 许建平,许在元.中国物叙事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J].社会科学战线,2024(07):157-167.
- [6] 傅敬民.译者行为批评的系统逻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44(03):12-24+50.

-
- [7] 肖娟,何高大.英美汉学视域中的“三言”“二拍”:译介与跨文化阐释[J].外语电化教学,2024(02):32-37+105.
- [8] 罗灵,温俊.明代“四大奇书”英译研究述略[J].社会科学动态,2023(12):110-115.

Functional Narration and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eroes' Names in Outlaws of the Marsh

CHEN Liang^{1*}, HE Haowen², KAI Yuanyuan³, LI Chaofan¹, KOU Zeyu⁴

(1. Anhui Financ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50250, Malaysia; 3. Anhui Financ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4.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Kuala Lumpur 31900, Malaysi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names of marginal hero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an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ull translations by Pearl S. Buck and Sidney Shapiro, delves into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functional character narr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while Pearl S. Buck's translation pursues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text in naming characters, it also considers the practicality of expression, effectively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functional narratives, demonstrating a well-balanced approach between truth-seeking and practicality. Shapiro's trans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also emphasizing fidelity in naming, exhibits considerations for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in the functional narratives of some characters. Furthermore, both translators frequently employ the "retention" strategy in handling character names, but Shapiro tends to favor "omission" while Pearl S. Buck prefers "transformation" in specific tactics. This research incorporates character naming and functional narrative into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evaluating the translations' performance in conveying the literary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work from both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Keywords: *Outlaws of the Marsh*; English translations; Functional character narrative; Translator behavior